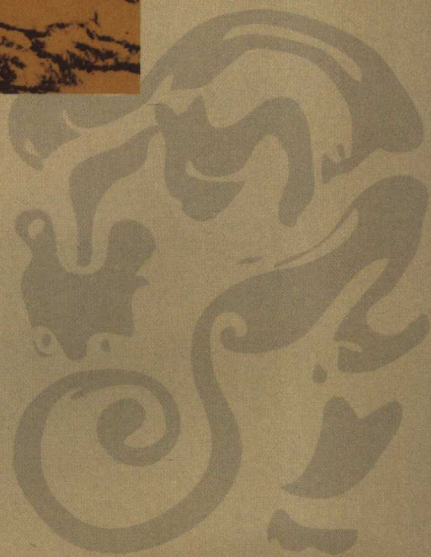


陈广宏◎著

竟陵派研究



 復旦大學出版社



陈广宏◎著

竟陵派研究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竟陵派研究/陈广宏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6. 8

ISBN 7-309-03008-7

I. 竟… II. 陈… III. 竟陵派-文学研究 IV. I209.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2162 号

竟陵派研究

陈广宏 著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18853(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宋文涛

总编辑 高若海

出品人 贺圣遂

印刷 上海第二教育学院印刷厂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8.75

字数 424 千

版次 2006 年 8 月第二版第二次印刷

书号 ISBN 7-309-03008-7/I · 203

定价 3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一部文学流派研究的原创性论著。作者积二十年之功，专门以曾在晚明至清初文坛产生重大影响的竟陵派为研究对象，在发掘、清理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对其生长环境与形成、发展及实际发生影响的过程，作了征实而深细的考察和描述，并力图就其文学观念与主张、批评与创作实践等各个方面进行整合、贯通地研究，进而较为准确地把握明清文学的走向，在中国传统文学向近现代演进的历史行程中重新认识该文学流派的地位与作用。这也是第一部全然以竟陵派为专题展开全面系统探讨的论著。

目 录

绪论 有关竟陵派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1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竟陵派研究	2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竟陵派研究	8
台湾地区与海外的竟陵派研究	13
竟陵派研究的展望及新世纪的良好开端	16
第一章 万历中期以后的政治与学术	19
第一节 与国运相终始的晚明党争	21
第二节 整肃思想与矫革王学	60
第二章 嘉、隆以来文学风气之嬗变	84
第一节 后李、何时代	89
第二节 复古思潮的再振	102
第三节 “楚风”之崛起及其背景	114
第三章 发轫期:钟惺、谭元春早年在家乡的文学活动	131
第一节 钟、谭的才性与始习	131
第二节 钟、谭订交及其与京山黄玉社诸子的交往	144
第三节 《玄对斋集》与《简远堂诗》	154
第四章 成立期:有声两都间与另立深幽孤峭之宗	167
第一节 钟、谭在南京的拓辟	168
第二节 钟惺在北京的竞逐	183
第三节 《隐秀轩集》与“钟伯敬体”的形成	206

第四节 林古度、商家梅:追随入楚及其诗风的转变·····	219
第五章 发展前期:《诗归》盛行与“竟陵一脉”成为时响·····	233
第一节 《诗归》的选定及其流传·····	233
第二节 蔡复一与竟陵派·····	250
第三节 钟惺改南与钟、谭在江南的着力经营·····	261
第六章 发展后期:谭元春于竟陵派影响的进一步拓展·····	282
第一节 谭元春在北京的交游·····	285
第二节 谭元春在江西的交游·····	296
第三节 谭元春在湖广的交游·····	305
第七章 竟陵派的文学思想·····	317
第一节 钟、谭的诗学观念·····	318
第二节 竟陵派的诗歌评点之学·····	362
第八章 竟陵派的文学创作·····	416
第一节 虚怀静衷:一种理性化的审美观照·····	417
第二节 关于凄清荒寒的情韵风调·····	437
第三节 “噍音促节”与生涩奇拗之表现·····	455
结语 略论明末至清代对于竟陵派的评价·····	478
附录一 钟惺、谭元春文学活动系年·····	500
附录二 竟陵派研究有关著述目录汇编·····	553
主要征引参考文献·····	573
后记·····	593

绪 论

有关竟陵派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如所周知,竟陵派以其特异的创作与批评,曾在明末清初文坛产生过相当持久而深入的影响,钱谦益所谓“海内靡然从之,迄今三十余年”^①。然而也就从那时起,评论界的主流于该派作家皆极尽攻伐之能事,并将诗道与国运联系在一起,斥之为“诗妖”、“鬼趣”,为“亡国之音”。它所导致的结果,正如钱锺书先生指出的:“有清一代,鄙弃晚明诗文;顺、康以后,于启、禛家数无复见知闻知者。”^②竟陵派遂亦因而沉寂。

当时代进入 20 世纪,竟陵派的遭遇才出现了某种根本性的转机。它的起因或者说背景,是引起中国社会大震荡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及其五四新文学。与清初诸大家抨击竟陵派出于清算明末士风的动机相似,五四新文学的作家表彰晚明公安、竟陵派文学,是为了对整个封建思想文化作出清算并指示中国新文学的途径,虽说它的意义基本上仍是指向学术外的,但借着对晚明文学的提倡,竟陵派与公安派一起,作为一种突出的文学现象,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钱锺书在对沈启无编的《近代散文钞》(1932)一书所作的评论中,又曾写过这样一段话:“我在别处说

① 《刘司空诗集序》,《牧斋初学集》卷三十一。

② 《谈艺录》“补订 103 页”,中华书局,1984 年,第 422 页。

过,过去已是给现在支配着的;同一件过去的事实,因为现在的不同,发生了两种意义,我们常常把过去来补足现代的缺陷,适应现代的嗜好,‘黄金时代’不仅在将来,往往在过去,并且跟着现在转移;在西方,我举中世纪为例,在中国,我举明朝为例,这两个时代都正在翻过身来,沈先生这本书的出版,给我的说法一个有力的例证,我尤得为自己忻幸。”^①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五四新文学作家对清代文学价值观念的反动,构成了开展竟陵派研究的发端。

不过,我们在强调 20 世纪重提竟陵派之于前代的批判关系的一面时,仍不能忽视其所存在的继承关系。贯穿整个清代,对于竟陵派的创作与批评,其实一直存在着与主流批评不同的声音。尤其到了近代,一些作家对竟陵诗文的抉发以及对其小品文字的关注,都已显示出某种审美趣尚的变异。还是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中列举李慈铭、曾习经以下若干人对于钟惺、谭元春诗文创作所作的评语后,曾特别指出:“此等近代文献,亦今日沾沾焉自命为钟谭拨雾见日者,所宜知也。”^②这一提示,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竟陵派研究

如上所述,20 世纪的竟陵派研究肇始于五四新文学作家对于晚明文学的提倡。五四新文学的一项突出的成就,是文学语

① 《近代散文钞》,《写在人生边上》。转引自《钱锺书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 年,第 104—105 页。

② 《谈艺录》二九“补订二”,第 103 页。

言的革命,即用一种能够自由表达思想与感情的语言形式——现代白话文取代文言文,而在散文方面的成绩尤为显著。在试图为现代散文寻找某种存在的依据或建立某种范式时,人们很自然地会溯源至明清小品散文。在20年代后半叶至30年代初,已经出现了不少这方面的探索。如钟敬文的《试谈小品文》(《文学周报》1928,10)、魏紫铭的《明清小品诗文研究》(《北强月刊》二卷五期)、李素伯的《小品散文研究》(1932)等等。当然,在这里不能不提到周作人,他可以说是当时自觉地对现代新文学的缘起、源流以及晚明文学的意义进行反思的代表人物。早在1923年,他在收入《谈龙集》中一篇叫做《地方与文艺》的文章中,就已经提到了明末的文学运动。1932年,他在辅仁大学所作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著名的讲演中,正式提出:“明末的文学,是现在这次文学运动的来源,而清朝的文学,则是这次文学运动的原因。”^①他着重从现代与明末两次文学运动的“主张与趋势”进行了比较,而其要旨,用林语堂在《新旧文学》一文的阐发,即“把现代散文溯源于明末之公安、竟陵派”,“以现代散文为继性灵派之遗绪”^②。这一观点,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些探讨公安、竟陵派的专题文章开始出现了。如沈启无在《人间世》六期上发表的《帝京景物略》、十三期上发表的《闲步偶记》(中有“记隐秀轩集”),怀琛在《读书顾问》二期上发表的《公安竟陵的疙瘩》(1934,7),刘燮在《人间世》十六期上发表的《公安竟陵小品文读后题》(1934,11),陈子展在生活书店发行的《文学百题》中发表的《什么叫“公安派”和“竟陵派”,他们的作风和影响怎样》(1935,7),同年在《小

①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第三讲,北平人文书店,1932年,第55页。

② 《林语堂文集》第十卷,作家出版社,1996年,第246页。

品文与漫画》上发表的《公安竟陵和小品文》，府丙麟在《约翰声》四十六期上发表的《公安竟陵派之文学》(1935,12)，以及周作人在《宇宙风》十四期上发表的《陶筠庵论竟陵派》(1936,4)等。与此同时，以公安、竟陵派为代表的晚明作家作品也得以大量地翻印出版。如周作人作序、沈启无编选的《近代散文钞》，林语堂、刘大杰标校的《袁中郎全集》，施蛰存主编，由周作人、沈启无推荐书目，包括钟惺《钟伯敬合集》、谭元春《谭友夏合集》在内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以及由林语堂主持出版的《有不为斋丛书》等。

从这一时期的有关论述，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些特点：其一，竟陵派在这时受到关注并获得翻案，始终是附着于公安派的，无论是表彰明末文学的革命精神还是阐发“性灵”的内涵，其侧重点都在公安一派，竟陵派自身在文学史上独特的地位、作用尚未能得到完全独立的评估。其二，当时人们所关注、探讨的焦点，主要是公安、竟陵的小品散文，对于它们的诗学理论主张以及诗歌创作等方面，并未有任何比较深入的阐发，而事实上像竟陵派在晚明文坛的地位，主要是由它的诗歌批评及创作影响而奠立的。其三，作为对于现实问题的一种回应，从根本上说，人们提倡公安、竟陵，并非站在学术的立场，如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所说的“我本不是研究中国文学史的，这只是临时随便说的闲话，……当作谈天的资料对朋友们谈谈也还不妨，若是算它是学术论文那样去办，那实是不敢当的”^①，虽是谦辞，却未必不是实情。事实上，一切都是为现代新文学张本的。这当中值得注意的是陈子展与府丙麟的相关文章，因为他们已经在

^①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小引，第2页。

不同程度上试图说明,公安、竟陵作为历史上的一种文学现象,是怎样的一种存在,并且,在分析两派主要的文学主张与作风时,已经有意识地在较析它们的异同,尽管他们的出发点仍在于探讨公安、竟陵文学对于现代是否具有意义。

在回顾、总结上一世纪竟陵派研究得以正式开展的学术历程时,我们必须对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这样的现代学科的发展、建设在其中的作用予以充分的估计。在这方面成就最为突出的,是郭绍虞先生在1941年3月发表的《竟陵派诗论》,这本来就是他撰写《中国文学批评史》的一项成果。在他正式阐释竟陵派之论诗主张之前,有一段说明撰作此文缘起的绪言显示了他富有识见的学术立场。他说:

近人每以公安与竟陵并称,而属之于小品文一类。实则公安与竟陵相同者,仅在反抗七子的一点。除此点外,公安、竟陵的作风正不相同。不仅作风不同,即其理论亦颇不一致。关于公安派之诗论,已见拙作《性灵说》一文,载《燕京学报》二十三期,兹不复述。至于竟陵派之诗论,自钱牧斋加以攻击之后,一般人以耳为目,都有贬视钟、谭之意。即近人之提倡小品文者,对于公安、竟陵之作风虽加表彰,而于竟陵派之论诗宗旨,似亦未见有何阐发之处。本文所述,即在阐说竟陵派之论诗主张以明他在历史上的地位;既不是贬弹,也不同意提倡,只因为诗论中间不妨有此一种主张,所以便有说明的需要。^①

^① 此文见载于《学林》第5辑。

在这里,他十分清楚地看到时人在认识公安、竟陵派时的误区所在,故极有针对性地将自己批评史中对公安、竟陵派诗论的阐述分别拿出来发表,既着重辨明两派理论、作风之不同,又借此阐发这一时期人们所忽视了的兩派各自的诗学成就。尤为可贵的是,他的出发点完全是学术的,“既不是贬弹,也不同提倡”,而只是从文学现象存在的本身去加以认知、说明,以期能真正给予一个“公允的论断”。他在文中着力于评价上将开创风气者与其后的流弊分开,将作者的创作作风与作为理想标准的批评分开,肯定钟、谭理论主张上对于七子、公安派的发展,又指出他们在批评与创作实践诸环节矛盾的症结所在,可以说是第一次从文学理论与批评的范畴,对竟陵派作出较为深入而客观的剖析与评判。从他一些比较精到的论述来看,现在不少有关的论述尚未能超出他的范围。

在此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有关竟陵派研究的单篇论文一篇也没有出现。这期间,中国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十分重大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后,除了一些文学史著作当中常以批评的口吻对竟陵派有所论及外,纯粹属于这一领域的研究几乎中断。其原因恐怕还不能完全归之于大陆的学术在特殊的历史阶段进入了某种萧条期,因为至少像公安派的研究,建国前后也都还一直有文章发表,不管其学术立场如何。问题是竟陵派自身的作风令其在新时代处于一种尴尬的地位,它不像公安派尚有某种比较鲜明的反叛传统精神可供挾发、张扬,它那种更关注个人“孤衷峭性”的创作风格在当时反映社会现实生活与人民性的标准下,弃之不足惜,大施批判又嫌不够格,因为自清顺、康之后,竟陵派的沉寂使它在文学史上仿佛被人所遗忘,20世纪二三十年代对明末文学的提倡,亦因它仅仅是附着于公安派的点缀,在

文学史上的地位并无多少实际的提升,相比较公安派,反而因此在人们的观念中加强了某种小宗小派的印象。在台湾编的一本有关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著述的大型分类目录中,于这段时期的竟陵派研究这一栏,仅著录了郑振铎 1957 年版的《中国文学研究》中有《公安派与竟陵派》一节,但郑先生的那部著作,其实主要是他解放以前有关古典文学研究论述的结集;另外便是钱锺书 1965 年版的《谈艺录》中有关竟陵派论述的部分,同样的问题是,该书第一版是 1948 年出版的。因此,严格地说起来,他们的研究基本上仍应属于我们本小节所论的三四十年代这一时期。

钱锺书先生的论述是继郭绍虞《竟陵派诗论》之后又一极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他的着眼点主要在钟、谭的诗歌创作方面,其中将他们与公安三袁在才情词气上的高下比较,钟、谭之间才性诗风的细微判别及与晚唐诗人的风格比照,乃至像对谭诗前后期的分析,精微的鉴赏力和富足的学养均非常人所能达到。在补订中,所涉及的内容更加丰富。他一是补充列举了自己所经见的清代以来,尤其是近代一些论者于钟、谭诗文的评价,品评其得失,并提示这些近代文献之于今之倡言公安、竟陵者的意义;一是进而深入钟、谭论诗方面,在整个文学批评史上探寻主“灵”说的渊源承继关系,在严羽、刘辰翁、钟惺、王士禛之间找出一种内质上的联系。值得注意的还有他提出的“吾国诗画标准相反;画推摩诘,而诗尊子美”的论题,这可以对我们认识何以竟陵派诗歌历来评价不高有诸多启发。此外便是对《诗归》以禅说诗、并以读诗为参禅的阐发。所有这些精深的看法,对于推进竟陵派的研究都有很重要的意义,可惜后来的研究者真正对此关注并吸纳的并不太多。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竟陵派研究

一直到 1983 年,吴调公在《文学评论》第 3 期上发表了《为竟陵派一辩》一文,在当时颇有些振聋发聩的效果,标志着大陆竟陵派研究一个新的时期的到来。与之相呼应的,是尹恭弘在 1983 年 5 月 3 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栏上发表的《略谈谭元春的诗歌创作》一文。时至 20 世纪 80 年代,突然出现对竟陵派这样的文学流派的关注并欲为之正名,应该说有着深刻的文化背景。80 年代初,随着社会意识形态在“文革”之后重新获得某种解放,学术的标准也开始重新定位。就文学而言,所谓“思想性”定于一尊的格局被打破,人们自然重新关注那些曾以自己特定的存在理由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又因种种原因在各个时代引起剧烈争议,特别是在当代仍遭否定或忽视的文学现象及流派、作家作品,希望能重新发掘其价值与意义。被吴文称之为“一个命运多舛的流派”的竟陵派,无疑具有相当的典型性。因此,以之作为重评的个案,显示了论者具有相当敏锐的学术眼光。吴文采用一种驳论的形式,自设“驳所谓竟陵派的‘孤芳自赏’说”、“驳所谓竟陵派主‘信笔扫抹’说”、“驳所谓竟陵派的‘但趣新隽,不原风格’说”、“驳所谓竟陵派诗境狭隘说”、“驳所谓竟陵派不如后七子说”等若干论题,力图对钱谦益以来诸种他认为有代表性的责难逐一辟解,为竟陵派主持公论。不过,由于长期以来缺乏正常的学术积累,甚至前此已有的研究成果也曾遭到否定,这样的创论性文章也存在着两方面的问题。一是有关竟陵派的基本面目及一些基本史实尚有未及梳理清楚之

处,二是在评价尺度的把握上略有过度。然而不管怎么说,这篇文章在这个时代的出现,具有很大的意义,它开启了重新认识、评价竟陵派文学的全新局面,使之在稍后骤然成为中国古代文学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次年,吴调公先生指导的研究生王恺完成了他在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学位论文《从〈诗归〉看钟、谭诗歌鉴赏论》,这在当时的大陆是第一部专门以竟陵派作家的诗学思想为研究对象的专业学位论文。

随后,1984年8月在湖北成立了竟陵派文学研究会。1985年5月又在天门县召开了第一届全国性的竟陵派学术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来自三十二所高校的一百三十多位学者,提交论文四十余篇。天门县县长出席了会议并作了长篇发言,《光明日报》、《湖北日报》等都发了消息,盛况空前。与会论文经挑选后有三十余篇结集成《竟陵派与晚明文学新思潮》,在1987年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由一篇翻案的文章触发如此盛大的对一个文学流派的研究运动,这或许是《为竟陵派一辩》的作者事先也未曾料到的,不过这一研究热潮一个更为关键的缘起,应该是80年代兴起的文化热所导致的对地域文化或者说乡土文化的热切关注,程千帆先生为首届竟陵派学术讨论会的题词“发扬楚学”,多少可以说明这一点。从大会递交的论文来看,涉及的面比较广泛,在重新评价竟陵派在文学史上地位的主题下,从钟、谭生卒年的考订及有关传记资料的整理,到他们的政治倾向及生活时代背景的考察,从钟、谭诗学思想与创作风格的剖析,到具体的竟陵派散文艺术成就、山水文学理论、钟谭在史学与艺术方面的评点等的探讨与评价,都有论述,在学术上有了一个良好的开局。然而,这样大好的研究局面毕竟来得迟了一些,何况曾经有过的研究又发生了长时间的中断,因而有许多问题的探讨

与论述大都还处在重新起步的阶段。此外的一问题是,一些论者有着比较强烈地表彰乡先贤及本地域文化的动机,因而在为竟陵派长期以来遭受不公正待遇辩解的同时,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有某种拔高其地位与成就的倾向,一定要将其定位在与公安派双峰并峙的高度,而未能对公安、竟陵两派在晚明文学新思潮中所表现的实际差异作更为全面、客观的考察。其后,至1987年5月,又在湖北天门市召开了第二届竟陵派学术讨论会。此次会议的主题相对比较集中,主要是围绕钟、谭的文学观念及其评选的《古唐诗归》,对竟陵派的美学思想及其批评观作出进一步的探析、研究,也还有其他方面的探讨,显示出该领域的研究正在逐步走向发展与成熟。

竟陵派文学研究会的成立和这两次有关竟陵派文学的学术讨论会,对于推动整个大陆学术界在竟陵派研究领域的深入开展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在这期间,全国涌现了大约近百篇有关钟、谭及竟陵派研究的专题论文,陆续整理出版了钟惺、谭元春的全集、各种选集以及《诗归》等诸多竟陵派作家的著作(楚地的专家学者致力尤多),并且涌现了像王恺、邬国平、李先耕等一批比较突出的专门致力于该领域研究的中青年学者。在对钟、谭及其竟陵派基本面貌的认识与描述上,较之建国后最新的学术成果(以《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有关钟、谭及竟陵派的词条为代表),在准确性与全面性上明显有了很大的提高,不少内容获得了订正、充实。

在这里,我想对复旦大学的有关学者在这期间的竟陵派研究成果作一些介绍,他们在明代文学批评与明代文学研究方面,整体上投注了比较多的精力。1985年,复旦中文系语言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批评史专业的邬国平,在王运熙、顾易生两位教授

的指导下,完成了《钟惺、谭元春及其文学思想研究》的硕士学位论文,是大陆又一部对钟、谭文学思想作出比较全面的清理与评价的专业学位论文。作者首先从解析钟、谭各自在晚明党争中的立场入手,揭示这种复杂的社会政治关系对于他们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思想所产生的影响。在分析钟、谭文学思想的价值时,论文在整个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发展历史的背景下,找出钟、谭在文学理论上三方面的贡献:“诗为活物”观念的提出,为诗歌的鉴赏与批评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在对前后七子、公安派理论的矫正过程中,能扬长避短,铸成明代文学批评流派中理论内容最为充实的一说;总结了一些富有价值的叙事诗的创作经验,填补了中国诗歌理论在这一方面长期存在的空白。论文的最后一部分针对一般论者认为的明末清初的批评家与竟陵派之间只存在批判关系,不存在继承关系的观点,强调钟、谭在明、清之际文艺思潮变迁中实际存在的承上启下的影响与作用,更关注此际文学思想上连续性的一面。这些论述体现了作者颇为独到的心得,材料上也显得比较详慎。复旦大学古籍所的马美信与谈蓓芳相继在1985年第5期《复旦学报》与1989年第1期《复旦学报》发表的《论公安派与竟陵派的分歧》、《明代后期文学思想演变的一个侧面——从屠隆到竟陵派》,则都试图从整个晚明文学表现个性解放新思潮的演变过程,来考察竟陵派的实际地位。他们通过对公安派、竟陵派及其他同时代的文学家有关“性灵”主张内涵的细致辨析,认为与公安派相比,竟陵派的文学思想实际上有了更多回归传统的内容,因而标志着晚明新思潮的消退或者落潮。这样一种认识,是受到了章培恒教授的启发的,在他有关明代文学与批评的讲授及著述中,对此都有比较具体的论述。笔者也是在章培恒教授的指导下,于1987年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